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

◎ 郭贵春 贺天平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

郭贵春 贺天平 主编

本书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度重点项目“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项目编号 02JAZ720004)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联合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文集的形式展示语用哲学的研究成果,以语用思维的历史演变为主线,全面揭示语用思维在哲学发展中的本质特征和意义。全书分五个部分:(1)语用学比较研究;(2)语用学理论分析;(3)科学隐喻;(4)语境;(5)自然科学中的语用方法。

本书适于科技哲学工作者、相关专业的大学师生及哲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郭贵春,贺天平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7-03-016612-4

I. 现… II. ①郭…②贺… III. 语用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165 号

责任编辑:孔国平 王剑虹 / 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0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印数:1—2 000 字数:348 000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编委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成素梅	乔瑞金	杨小明
李红	张汉静	张培富	郭剑波
郭贵春	高策	殷杰	魏屹东

序 言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显著地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学的哲学化特征。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历史语境中,语用思维的发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以全新方法求解哲学难题的需要,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使用的有效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的诞生。从总体上来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极为鲜明地体现出语用哲学思想不断扩张和强化的趋势,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性演进:

一是“语言学转向”。发生于 20 世纪前半期,以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和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为代表。他们主要从语形及语义角度切入哲学问题,创造了语义哲学,并试图以此为手段解决哲学命题的意义及证实等重大问题。“语言学转向”带给 20 世纪哲学研究以根本性、启迪性和创造性的影响,不仅使英美哲学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实践的革命,用语言的“语形-语义”维度来改造传统哲学命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大陆传统哲学的思路,使之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分析的技术工具日益成熟,为西方语用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技术上的可能性。事实上,正是由于单纯借助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法在求解哲学难题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才使得哲学家们开始寻求其他的可能途径,最终发现了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语用分析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必然蕴涵着语用哲学大行其道的肇始。

二是“解释学转向”。始于库恩、玛丽·海西(Mary Hesse)、费耶阿本德等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根据科学主义教条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哲学实践。解释学转向的基本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达到“视阈融合”,从而在一切文本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

性。解释学转向主张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社会性交往的实践,突出文本上下文和历史语境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为语用分析思想的充分体现和展开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应用平台。

三是“修辞学转向”。这是一种在现代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的基础上试图将古代传统的劝说艺术重建为一种全新的论证艺术的哲学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普莱利、西门斯、夏佩尔和佩拉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将修辞学引入了一般哲学的研究,推动了哲学修辞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进而逐步形成了哲学领域的修辞学转向,并构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重新建构探索的最新趋向。修辞学转向的目的在于把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哲学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哲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在哲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位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在修辞学转向中,语用分析思想作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方法论特征,广泛渗透到这一运动的几乎所有层面。

随着哲学三大转向的推进,语用思维和语用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深入而广泛的应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解释学转向的影响和修辞学转向的促动下,以格赖斯、奎因、戴维森和塞尔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借用语言语用学的研究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推动了哲学语用分析思想的形成。语用分析方法作为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这三大语言哲学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横断研究的方法论,逐渐渗透和扩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日益鲜明地呈现出自身所独具的特征和意义。由此,语用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于语用哲学的基本思想对哲学问题的洞察来解决哲学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及其交流进行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这一哲学发展方向的改变,其最重要的后果就在于造成了哲学逻辑朝向哲学语用学全面转向的趋势,形成了新的哲学发展的生长点。

对语用思维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和开拓性。客观论之,目前国际上对语用哲学的研究多半仍不能摆脱单纯的言语语用学层面,呈现出一种零散和不全面的特征。这是一个亟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在一些基础性问题寻求难点突破的领域。本书立足于对语言哲学历史演化和现代趋向的分析,以语用思维的历史演

变为主线、语用分析方法为核心,以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核心问题进行语用求解为重点,注重对于语用哲学基本概念、结构、框架和意义等重要问题的澄清,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多个角度建构语用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厘清语用分析方法在哲学认识和科学求解中的效用和机制,进而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重新解释和建构,全面而系统地展示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的研究成果,并密切关注这种语言分析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应用,深入揭示语用思维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本质特征和功能意义。基于以上目的和设计思路,本书在编排上采取“总体建构、重点突破”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 语用学比较研究。自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修辞学》以及中世纪的修辞、逻辑、语法三学科开始,语用观念便深嵌于科学研究和哲学理论中。本书对英、美、法、德四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以其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用哲学奠定了基本理念;在美国,哲学家塞尔和格莱斯继承了言语行为思想并发展了一种对话蕴涵理论;相对而言,法国哲学家则更多地关注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在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多重视角观照下创立了法国经验主义语用哲学;德国语用哲学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以及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为代表,注重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和理解等问题。这些语用哲学家们共同倡导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的观念,并强调把语用哲学与对科学知识的探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2) 语用学理论分析。在前一部分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从总体上进行了语用哲学的元理论分析。首先从静态的角度考察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指出两者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从而体现为不同的认知形式;接着从动态上分析了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重新定义了语言的三元划分结构,并将语用域面推到了哲学方法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强调了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的演化过程,指出只有从科学共同体的意向、心理、行为等方面综合建构的科学语用学才能对科学解释,从而对科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真正的认识;最后分析了语用学转向和语用分析方法的意義,指出语用哲学作为后分析哲学的基本趋向内在地显示了“当代哲学无不带有语用”这一重要特征。

(3) 科学隐喻。隐喻是在特殊的语用语境中生成的,其意义的实现也是由语用语境的选择性和相关性所保证的。隐喻是哲学语用方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隐喻的分析方法渗透在语用哲学的任何一个角落。本书相关内容首先论述了隐喻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接着深入阐述了作为一种“超逻辑形式”的科学凝集,科学隐喻在本质上体现了理解与选择、经验与概念、理性与非理性的语用统一。

(4) 语境。语用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及其意义是以语境的实在性为前提的。没有语境的实在性,就没有语用分析的方法论性;而没有语用的方法论性,就没有语境的现实性。所以,在语境的基底上去谈论语用哲学的意义及其方法论趋向,是一种语用哲学研究的本质要求。这也就是说,必须立足于语境实在论的视角,在语境的基底上揭示语用哲学的形式、结构、特征和本质,表明它未来发展的趋向性,从而展示语用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魅力。

(5) 自然科学中的语用方法。当代科学哲学家已经达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共识,即语用分析方法广泛地渗透在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中。从数学到物理学、从化学到信息科学乃至心理学,无处不能找到语用分析方法的踪迹。本书相关章节将自然科学与语用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的汇编,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杂志上发表,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根据需要,我们从内容和体例上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在此,谨对以上期刊各位编委的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书的发表受到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和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可作为西方哲学各专业尤其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研究者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阅读书目。希望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当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郭贵春

2005年10月于山西大学

目 录

序 言	(i)
-----------	-----

语用学比较研究

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郭贵春 殷 杰 (1)
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郭贵春 殷 杰 (10)
美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殷 杰 (18)
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郭贵春 殷 杰 (27)
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殷 杰 郭贵春 (35)

语用学理论分析

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	殷 杰 郭贵春 (46)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	郭贵春 殷 杰 (55)
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	殷 杰 郭贵春 (65)
当代反实在论语用分析的语境化建构	胡瑞娜 郭贵春 (73)
语用分析方法的意义	郭贵春 (82)

科学 隐 喻

隐喻与科学理论的陈述	郭贵春 安 军 (92)
科学隐喻的本质	安 军 郭贵春 (102)
科学隐喻：“超逻辑形式”的科学凝集	贺天平 郭贵春 (113)
隐喻的语境分析	郭贵春 安 军 (124)
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	郭贵春 (135)

语 境

指称理论的演变及其语境重建	郭贵春 刘高岑 (149)
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困境与出路	郭贵春 成素梅 (161)
科学实在论的语境重建	郭贵春 (175)
隐变量理论与语境选择	贺天平 郭贵春 (184)
语境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郭贵春 (193)

自然科学中的语用方法

模态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贺天平 郭贵春 (202)
----------------------	---------------

从信息传输看量子测量过程	郭贵春	赵 丹(210)
当代数学哲学的语境选择及其意义	郭贵春	康仕慧(219)
对概率论起源的思考	郭贵春	宋尚玮(231)
数学是逻辑吗	郭贵春	刘 杰(241)
试论科学心理学解释的自主性	王姝彦	郭贵春(251)
量子引力时空语境分析	郭贵春	程 瑞(260)
后记		(275)

语用学比较研究

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郭贵春 殷 杰

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使用的有效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本文之目的,正是要通过历史地考察语用思维在这些哲学传统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客观地展示语用思维形成发展的路径和形态特征。

1. 语用学的哲学渊源

一般来说,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①亚里士多德的语用学。亚里士多德指出,“每一个句子都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每个句子都是做出了陈述的句子,而仅仅那些可为真或为假的句子才是。并不是在所有句子中都存在真或假:恳求是一种句子,但既不真也不假。当前的研究解决了做出了陈述的句子,而其他则未考虑,因为对它们的思考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研究”^[1]。这样,他提供了语用思维发展的最初萌芽。②欧洲“原型语用学”(protopragmatics)(1785~1835)。包括洛克、康德思想和波尔-罗亚尔普遍语法等。③美国实用主义(1860~1930)。包括实用主义奠基者皮尔士(C. Peirce)、詹姆斯(W. James)和杜威(J. Dewey)的思想。④近代语用学(1880~1935)。包括比勒(K. Bühler)、奥斯汀等人的思想,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初步形成。⑤当代语用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即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语用学(源于英美),作为对话理论的语用学(源于法国),作为普遍语用学的语用学(源于德国)和作为符号学之一部分的语用学(源于英美)。^[2]

具体来看,在主要哲学传统国家,语用思维的发展系谱和基本内容为:

* 原载于《阴山学刊》,2004年第5期,本文在原文基础上做了部分修改。

其一,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肇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康德在知识建构中的图式论和符号观念,把语言的因素引入理性的建构中,“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简单地就是一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并且我们能够形成这门科学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他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它属于语言的事情”^[3]。为了探询经验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因而它将实际地成为一种语法的研究,即按照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一样。在此,康德事实上把他的先验哲学塑造在其时代的普遍语法之上,语言的形式将理想地反映思想的形式,促成了他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康德之后,直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里,在语用问题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费希特、罗斯(G. Roth)、维特(S. Vater)和洪堡特(W. Humboldt)等在内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表征理论,并把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语言中精神和表征间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他们把康德的图式理论结合进语言理论中,语言取代了康德的图式论在其哲学中的作用,与概念和直觉结合在一起,使语言对于思维具有了核心的作用。

随着康德时代的结束,德国哲学和语言学开始试图把语言从浪漫的灵魂和先验的精神中分离出来,并把它带入人类活动和广泛情景中。特别是比勒(K. Bühler)区别了语言的三种功能:表征、表达和请求,把语言的这三个功能视为语言或意义的三个维度,强调这些维度不能彼此排斥,逻辑研究表征,修辞学研究表达和请求。这种语用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结了德国在康德之后对语用的洞察,又启迪了当代德国哲学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语用观念,这使比勒成为德国语用思想发展之链中重要的一环。

其二,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英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以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为开端,洛克第一个把语言视为一种不能被认识论所忽视、也不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工具。洛克指出:“所有能够位于人类理智中的东西,或者是,第一,事物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或者是,第二,人类自己为了各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幸福,而理性和自愿地去做行动;或者是,第三,获得和交流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手段。”^[4]洛克在此所讲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符号学或符号的学说,是语词通常存在的地方”。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还是人类目标的实现,语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通过人类观念的符号(语词),才能向其他人交流思想,因此理智知识本质上就是符号,只有在人类能够理解自身的语词并能够与他人相互理解和交流时,知识才成为可能。

从洛克所开创的这一思路出发,英国17~18世纪伟大的经验论哲学家霍布斯、贝克莱、休谟与常识论哲家里德(T. Reid)将对语言使用的认识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揭示语言的本质,形成了语言和社会的语用哲学。

经验论之后英国语用思维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中,是一种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在内的语言使用观念。特别是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间的不同,言有所述形成叙述句,可以为真或假;言有所为则构成施行句,无真假。^[5]我们能够施行一种行为和通过使用特定形式的词从而让其他人施行特定行为,在使用语言时总是施行某种行为,语言和世界在单一的、公开的、可观察的和可分析的行为中结合到一起。

其三,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中的驱动力,最早播下法国语用思想种子的是笛卡儿。尽管笛卡儿几乎未谈及具体语言或普遍语法,但他的哲学方法对于当时波特-罗亚尔语法(The Port-Royal Grammar)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影响了语用思想在法国的出现。这种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系统,而且是一种符号系统,对应着人类的三种基本的心灵行为,即感觉、判断和推理。

其后,法国语言哲学家孔狄亚克(E. Condillac)和布列阿尔(M. Bréal)认识到语言并不仅仅是分析思想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手段。为此,他们从一种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待语言,认为全部语言都源自于一种原初的“行为语言”,语言因此在成为表征工具之前就是一种人类行为,它不会在人类活动之外存在,语言中的一切都来自人类并面向于人类,所以讲话是心灵的行为,需要发现的是语言的理智规则,即语言的语义和语用规则,因为并不存在“自然规则”,而只有“人类行为的规则”。

这一语言的语用和对话理论开创了法国将言语和语言置于个体的和社会的心理学中研究的传统,包括鲍汗(F. Paulhan)、柏格森和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等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将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因素引入对语言本质和言语行为的分析中,改变了以往对意义和思想间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意义和行为间关系的研究,认为重要的不是通过语句来表达思想,而是由此引起听者的行为趋向,因此,语言具有双重本质,它是思想表征的工具和行为的工具,一个句子的言说不仅具有一种符号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社会的或实践的功能。

其四,美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美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滥觞于皮尔士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遍符号学,他把实用主义视为符号和意义的普遍理论的符号学的一部分,更使语用思维在美国有了体系性和建设性的发展。

最后,莫里斯在英美语用学和大陆语用学的发展和融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整个一生的雄心之一就是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这三种发展于美国和20世纪前半期欧洲的哲学间架起桥梁。在继承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和杜威的行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莫里斯创立了行为主义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自己对符号的研究命名为指号学,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各自强调它的语形、语义和语用方面是片面的,事实上,符号具有三种类型的关系,包括与其他符

号、与对象以及与人关系,他把解决这三种符号关系的理论分别称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6]莫里斯的行为主义语用学改变了把语用学单纯地视为与思想和心灵理论相关的传统观念,把语言的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于指号学中,从而研究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有助于符号的、逻辑的、行为的、心理的和认识论知识的统一。

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统中所各自发展出的这些语用观念共同促进了一种新的独立的学科形式——语用学的诞生。可以说,现代语用学自身正是由这四个独立成分构成的混合体,即源于英国的言语行为理论、源于法国的对话理论、源于德国的普遍语用学和源于美国的符号学。它们一方面与认知科学,另一方面与交流的社会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自身特有的对象、论域、目标和理论体系。^[7]

当然,这种语用思维在德国的发展表现出与英国、法国和美国非常不同的风格。在德国,康德把语言视为是理性的外在化和异化的唯一工具,因此,对语言的关注和规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现理性和道德的那些先验的和最高的原则,这一立场中经费希特和洪堡特等人直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没有改变,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语用学”;而在英美哲学传统中,洛克所培育出来的语用思维则源于对语言的不完全性和私人性这些先天缺陷的治疗,更多地是为了知识和经验的传达而关注于语言的规则和使用技术,包括奥斯汀、塞尔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语用学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语用思考的,是一种“经验主义语用学”。这就使得“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在两种传统中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功效、主题和路向,德国传统研究语用学是为了寻求“知识基础”(foundation of knowledge),或者说是为了寻求知识奠基的策略,是一种“元谈论”,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所以特别地关注于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理解(understanding)这两个重要特征。

而英美传统研究语用学的目的是为了制定“话语规则”(rules of discourse),或者说是会话基本准则,解决的是当下情景中交流的顺畅问题,是一种“对象谈论”,而不是寻求交流理性的普遍的和先在的原则,因此,通过对语言的句式、语气、效果等的分析来区别句子和言语行为的类型,更多强调的是讲话者的意向性、语言约定以及具体的言语行为问题,从而为了交流的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最终是为使交流的目标明确,朝向对话者共同关心的方向而提出合作原则以及基本的对话准则。

应当看到,尽管两种传统在语用学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同时也在语用的意义上统一起来,无论是先验的知识基础,还是当下的话语规则,最终都是为了主体的对话和知识的交流。它们在各自目标的实现当中发现了语用分析的意义,从而也就有机会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理论和观念,有了对话和交流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对语用思维的共同关注,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大陆哲学和

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语言的问题上,在语用学的问题上走到了一起,是语用学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毫不夸张地说,语言哲学是20世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桥梁,而语用学则构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当代形式。

2. 语用思维的现代建构

在当代语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分别体现了英美和大陆哲学传统的风格,可以说是语用思维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

其一,英美风格的维特根斯坦式语用思维的建构。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以“逻辑”为中心进行构架,认为逻辑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和世界的界限,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握语言的本质,解决语言如何能够表达和描述世界这一认识论问题。一方面,他把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作为分析命题,它们与经验事实无关,只是一种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的脚手架。这种语形学基础上的纯粹逻辑形式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事实存在于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思想创造了逻辑图像,逻辑图像是现实的模型,对事实进行描述,并通过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运用语义分析手段进入了思想的表达领域,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结在了一起。

但是这种基于语言逻辑的语形和语义分析所遭遇的困境也正是导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转向的根本动因。随着逻辑形式神话的破灭,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这种失败是一种哲学基本观念上的失败,即把哲学看作是对命题形式的逻辑的、语形的和语义的分析,并认为这种分析能够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但事实上,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根据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这一思想最终促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向”。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他完全改变了探讨语言本性和语言表象的方法论策略,提出“语言游戏论”重新定位语言性质和语言功能,使用语用分析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并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意义实体,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

应当看到,维特根斯坦从以“逻辑”为核心的语言分析方法转向以“语境”分析为核心的语用学,其本质在于把语言、知识和科学置于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识,在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也不可能给语言的实

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它没有改变任何东西”^[8]。哲学只是一种阐释性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搞清楚日常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因为正是语言的语法产生了哲学困惑,它把我们引入了歧途,而忽视了不同的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所以,只有正确描述语法和语言用法的确切特征才是达到哲学的明晰的最好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用学更像是一本语言语法的哲学手册,它决不会去干涉现存的具体的语言语法,而是,在具体的语言语境中指导语法的使用。

其二,大陆风格的哈贝马斯语用思维建构。与维特根斯坦不同,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发展语用思维的。为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哈贝马斯考察了主体在社会中的四种不同行为类型:①工具行为,以目标和手段为取向,对应于客观世界;②规范调节行为,以群体的共同价值来确立个体的行为,对应于社会世界;③戏剧行为,公众通过自我表现或表演来吸引听众,对应于主观世界;④交流行为,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作为相互理解的工具,以期在行为上达成一致。在这种行为中,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整合在了一起。^[9]前三种行为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对自然控制以达到系统整合的目的;而交流行为则是一种定位于理解的行为,是行为主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10]。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只有建立在交流行为理论,即不是建立在主体性的、私人的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交流之上,才能获得成功。哈贝马斯的这种哲学的“语用学转向”,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做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流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11]。

哈贝马斯的这种“规范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思想的特征体现在:①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讲话者在表征事态和表达意向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施行相关的行为,言语之首要的功用并不是表明所述之命题内容,而是通过施行某种行为来建立人际关系。它启迪人们认识到语言的真正目的是去交流、达成理解并建立合理人际关系,而不是其他。②有效性主张是规范语用学的内核。进行交流的任何人,如果他想使交流成功的话,在施行任何以达成理解为基本取向的交流行为中必须提出普遍的、有交流能力的言语者自觉地遵守的基本预设——有效性主张,包括表达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命题的真理性(truth)、意向的真诚信性(truthfulness)和言说的适当性(rightness)。^[12]这些有效性主张作为每次交流行为的背景知识,只有在预设并满足它们时,交流行为才能得以持续。③交流模式的设计是规范语用学的目标。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式和施行式言说,前者以认知为目的,显题化了言说的命题内容,后者以交流为取向,显题化了

人际关系的建立,并给予表达式一种具有承诺的约束特征的施行语力,使得朝向世界的语言认知使用成为可能,讲话者和听者得以用言语行为建立起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命题/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被哈贝马斯所采纳并将之视为规范语用学理性重建的任务。

依靠这种交流模式,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就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的主观性的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使得交流行为运行在规范有序的理想环境中,交流理性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生活世界和系统获得了协调发展,由此,业已被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带入死胡同的社会批判理论真正地重新建构起来。

在大陆语用思维传统中,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思想也颇具代表性。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思想定位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张力中:①分析哲学中的语用趋向(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②传统符号学理论(皮尔士、莫里斯);③先验哲学(康德)。阿佩尔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发展他的先验语用学。一种是沿着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使用有效性主张观念以解释人类交流的逻辑。另一种则采取的是由皮尔士和莫里斯发展了的传统符号学理论。^[13]

阿佩尔使用由(真实)对象,符号和解释者(符号使用者)构成三元符号关系来澄清哲学史中的哲学种类。从阿佩尔的符号三元关系的“先验重解”的观点看,语用域既不当被建构为经验的行为(莫里斯),又不应当成为形式的建构(卡尔纳普),阿佩尔主张,我们不仅应当把一种先验解释指派给符号功能的语形·语义部分,而且应当给予它的语用域,即我们的实际语言使用的域。

3. 语用分析思维的意义

随着语用学转向的发展、语用思维的整体扩张以及语用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后半期,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这三大语言哲学分析方法,已经作为一种横断研究的方法论逐渐地渗透和扩张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语形学以句法形式为取向,形成逻辑——语形分析,语义学以言说对象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语用学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可以说,在排除寻求建立哲学大厦的“阿基米德点”的可能性后,现代哲学追求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规则的语言游戏,因此是参与者(包括讲话者和听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主客体模式,这事实上恢复了苏格拉底式哲学沉思的传统,即在对话中明晰思想,澄清观念,所以,整个哲学史就是在不断寻求这种对话平台或基础的历史,随着旧平台的倒塌,新平台的建立,所有的思想观念,包括语言的、科学的、逻辑的和价值的观念都会随之重新构筑自己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用思维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它为哲学的对话和辩论